

1.6 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的关键事件时间线

联合国系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多边组织是决定决策者是否以及如何使用证据来应对社会挑战的关键角色，他们本身也是证据的使用者。联合国系统是由一个秘书处、许多部门（如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基金（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专门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组成。这些多边组织如何看待社会挑战，极大地影响了决策的证据需求，尤其是在其成员国的政府政策制定者之间，以及在其组织领导人、专业人士和公民之间。同样地，他们如何看待使用证据来支持决策，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和他们的成员国所建立的证据支持系统。下文前两个清单提供了这些领域中关键发展的一些典型示例。

在过去的80年里，决策者通常会遇到各种证据类型的证据。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的随机对照试验（一种评估“什么有效”的方法），随后为技术评估、证据综合、指南和行为/实施研究。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刺激了数据分析和建模的快速发展。下文第三个清单提供了这些发展的一些典型示例。

关键发展：

挑战

多边组织如何看待社会挑战

- 首个在主要气候科学家之间定期达成协议的全局机制（第六次全球评估将于2021-2022年发布）和参与政府的共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1988）
- OECD层面首次承诺为实现关键目标制定有时限的任务：国际发展目标（1996-2015）*
- 首次全球承诺实现有时限的关键目标：千年发展目标（2000-2015）
- 首个关注动物-人类-生态系统以改善健康的多部门和跨学科框架：同一健康（2008）**
- 第二次全球承诺实现关键目标的有时限任务：可持续发展目标（2016-2030）

决策

多边组织如何看待使用证据支持决策

- 世界银行第一份专门针对该主题的报告：《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促进发展（1998-1999）》（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 第一个从依赖专家意见过渡到使用更严格的方法来制订推荐意见的联合国机构：《WHO指南制订手册（2003）》（WHO's guidelines for guidelines）
- WHO第一份专门针对该主题的报告：《增进健康知识的世界报告（2004）》（World report on knowledge for better health）
- 首次呼吁将发展努力建立在“有效的”基础上并加强国家对发展议程的所有权：《巴黎有效援助宣言（2005）》（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
- 联合国首个培养数据驱动行动的能力和推动者的战略：联合国秘书长的数据战略（2020）
- 联合国关于优先将证据综合作为应对社会挑战研究响应一部分的首份报告：《COVID-19复苏研究路线图（2020）》（UN research roadmap for the COVID-19 recovery）
- 世界银行第一份致力于使用数据推动发展目标的报告：《2021年世界发展报告：数据改善生活》（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Data for better lives）

* [oecd.org/dac/2508761.pdf](https://www.oecd.org/dac/2508761.pdf)

** [fao.org/3/ajl37e/ajl37e00.pdf](https://www.fao.org/3/ajl37e/ajl37e00.pdf)

- 早期的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展青霉素治疗普通感冒（1943）和链霉素治疗肺结核（1948）
- 参与者驱动（相对于调查者驱动）证据的概念是通过Lewin和Freire关于参与式行动研究（1946-1970）的工作提出
- 早期在社会科学使用的试验：Perry学前教育项目（1962-1967）和RAND健康保险试验（1971-1986）
- 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的成立（1974）
- 首次产生效果评估的证据综合：心理疗法（1977）***
- Cook和Campbell关于准试验的里程碑式的著作（1979）
- 关于数据可视化里程碑式的著作（1983）：Tufte编著的定量信息的视觉显示（第一版）
- 第一个有关护理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全领域概述：怀孕和分娩的有效护理（1989）
- Cochrane协作网和国际卫生技术评估机构协作网的建立（1993）
- Campbell协作网建立（2000）
- 首次产生效果评估的Campbell证据综合：Scared Straight计划（2002）
- 国际指南协作网建立（2002）
- 实施科学杂志创刊（2006）
- 第一本广泛阅读的有关使用行为见解的书籍：Nudge——改善有关健康 财富和幸福的决策（2008）

*** psycnet.apa.org/record/1978-10341-001



证据中介, Julia Belluz

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新闻工作者，严格地报道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挑战，现有的最佳科学告诉了我们什么，以及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COVID-19大流行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个充满挑战和令人迷失方向的时期，包括对我们所有试图理解和了解最新证据的人而言，我们想知道有关该病毒的信息以及如何保护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国家安全。在瞬息万变的信息环境中，我们不断挑战和更新假设，理解新的研究或政策带来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但好消息是，COVID-19也加速了全球推动开发和改进工具的进程，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人们在特定环境/情景下批判性考虑证据。我特别想到了证据综合和动态证据产品，本报告的**第4.4节**和**4.7节**对其进行了讨论。它们存在的理由在于汇集有关重要社会、政策和临床问题的最新和最佳证据，以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例如，COVID-END 数据库收录了各种高质量证据，从各类疫苗如何对抗新的冠状病毒变异株，到学校停课对最大限度地降低爆发风险的影响（更多示例见**第4.12节**）。这些工具理应成为新闻工作者报道此次大流行、下一次大流行和许多其他即将到来的社会挑战的重要资源。对于那些接受临床医生、公职人员和民选官员决策的人来说，这些工具也有可能挽救生命。我只希望这场大流行最终能帮助更多的人发现这些工具的价值并使用它们。

